

# 中东欧国家

2018年，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Fidesz）领导人欧尔班（Viktor Orbán）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四个总理任期，加上2015年波兰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赢得大选得以单独上台执政等一系列事件，2018年中东欧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便围绕着民粹主义、非自由主义、民主等问题展开。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左翼的现状和作为。

## 一、右翼民粹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兴起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中东欧的兴起被学者所关注。中东欧民粹主义具有非自由主义的特征，而欧尔班被视为这一非自由主义思潮的最典型代表，因此，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也被冠以“欧尔班化”（Orbánization）这个称呼，而“欧尔班化”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大化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鲍里斯·韦兹亚克（Boris Vežjak）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欧尔班化”已经扩大到了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理由是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的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在2018年6月3日的选举中获得了25%的选票，是排名第二的政党的两倍。在其25年的政治生涯中，作为民主党的党首，扬

沙曾两次执掌政府，最后一次却因为街头抗议而辞职，并在同一年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判入狱两年。不过，韦兹亚克的重点是，欧尔班和扬沙是多年的政治朋友并且有着相同的精神。这两人和马其顿的民族主义前总统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会面，主要讨论如何关闭巴尔干的移民通道。

韦兹亚克认为，欧尔班、扬沙和格鲁埃夫斯基预兆了一种政治趋势，即欧尔班化。欧尔班化有两个要素特征：一是欧洲民族主义，二是“非自由主义民主”。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尤其强调强政府和国家主权，在其中，个人自由日益受到限制，最终将从属于民族文化和传统。韦兹亚克指出，非自由主义可能代表着欧尔班化的一个关键的方面，而非自由主义也是现在斯洛文尼亚屈从的政治路径。尽管事实上政治异见者不会被噤声，但是他们不会得到政治支持，也没有人倾听他们的观点。既然“国家的”方案更加重要，那么异见者的资金将会枯竭，在经济领域中，私人倡议将占据上风，但是那些“右翼的”人将有优先权。公民社会不会被直接压制，但是他们也不再能获得基金支持。在匈牙利，右翼的成功激进化不仅表现为排外，而且表现为反罗姆人和反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也加入了这个阵营，表现出排外、恐惧伊斯兰。<sup>①</sup>

费伦茨·拉措（Ferenc Laczó）也指出，在过去十年里，民粹主义成为匈牙利政治的主要特征，青民盟领导的国家引领了欧盟的非自由主义转向，而这一切发生在匈牙利加入欧盟并且被认为是完成了自由民主转型之后。费伦茨·拉措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认为，在转型期间，转型叙事强调欧洲化和追赶西方，但是一旦转型完成，随着所期待的物质利益落空之后，这一制度化过程就失去了信用。与此同时，后共产主义的左翼经过1989年之初的繁荣之后便陷入了危机，在匈牙利尤其体现为当时的总理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承认向公众撒谎的谈话录音被泄露，从而彻底失去民心，这使得匈牙利国内根本没有有力的左翼制衡右翼民粹主义。除此之外，匈牙利的文化精英也很难发挥作用，一方面，匈牙利的文化精英反对国家正在行驶的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大学没有足够的基金，匈牙利知识分子缺少资源和国际机会，在自己的国家也难以获取主流媒体的支持。而很多选民并没有明确偏好的政党，他们只是对目前的事务状况不满。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匈牙利激进民粹主义获得成功。<sup>②</sup>

<sup>①</sup> Boris Vezjak, “Axis of Illiberalism”, in *Eurozine*, July 9, 2018.

<sup>②</sup> Ferenc Laczó, “Populism in Power in Hungary: Consolidation and Ongoing Radicalization”, in *Eurozine*, March 27, 2018.

马丁·霍利卡 (Martin Horicka) 则注意到, 许多中东欧年轻人具有右翼倾向而非相反。他认为传统上而言, 至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 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左翼。事实也表明, 年长的人更加保守而年轻人则倾向于更加自由主义, 这也符合已有的研究和科学文献。在欧洲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 这一理论很久都没有受到挑战, 尽管这一理论也有瑕疵, 例如年轻人似乎在社会问题上比在经济问题上更加自由主义, 但是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有效。然而, 中东欧地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右翼政党的很多选民是年轻人。马丁·霍利卡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过去, 以至于年轻人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 并且也知道左翼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变得多么极端。<sup>①</sup>

## 二、民主倒退抑或发展?

透过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很多学者看到的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挑战, 并围绕着中东欧是否出现了民主倒退而展开讨论。

赛恩·汉利 (Seán Hanley) 和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 (Milada Anna Vachudova) 分析了捷克的情况, 主要围绕着由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 (Andrej Babiš) 于 2011 年创建并领导的 ANO 运动展开。他们指出, ANO 的崛起被视为捷克通往“民粹主义民主”的关键转折, 标志着捷克之前稳定的政党体制已经结束了。他们还指出, 许多观察家认为巴比什不仅是民粹主义者, 而且是潜在的权威主义领导人, 他的崛起是东中欧更大范围的“民主倒退”的一部分; 还有观察者认为, 通过与总统泽曼 (Miloš Zeman) 的配合, 作为总理的巴比什开始解除自由主义民主, 就像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变化一样。赛恩·汉利和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认为, 尽管 2017 年 ANO 的选举胜利没有获得如同匈牙利青民盟在 2010 年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 2015 年那样的绝对议会多数, 但是有些东西不能被忽略: 具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党的崛起; 传统左翼的衰退; 居于文化分裂另一端 (激进右翼和社会一自由主义) 一翼的少数党及其运动的崛起。基于此, 赛恩·汉利和米拉达·安娜·瓦丘多娃的观点是, 经济寡头扭曲了民主代表制并削弱了对民主的信任, 但是他们自己是否能够有效

---

<sup>①</sup> Martin Horicka, “Why are Young Eastern European so Right-Wing?” in *American Thinker*, October 25, 2018.

地削弱自由民主并建立起非自由主义体制还尚不清楚。<sup>①</sup>

祖扎纳·胡达科娃 (Zuzana Hudáková) 通过分析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况, 也对民主问题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她指出, 尽管捷克和斯洛伐克不再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它们却面临同样的问题: 政治腐败和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危机。例如,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由于补贴欺诈受到欧盟和捷克警察的调查, 在斯洛伐克, 年轻记者 [指扬·库恰克 (Jan Kuciak) ——引者注] 及其未婚妻被枪杀一案所引发的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 (Robert Fico) 下台和两名部长的辞职都未能平息人们的愤怒和不满。在这两个国家, 人们公开挑战政治行为, 并呼吁公共行为中的“民主”。她认为, 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政治危机具有以下共同点: (1) 政治腐败和相关的调查成为激起民众不满的重要导火索。(2) 提前选举似乎并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境。(3) 这两个国家政治危机的核心都类似于 1989 年的危机。例如民众对库恰克的死亡感到愤怒, 要求改变政治, 要求言论自由, 终结腐败和不受惩罚, 要求安保服务改革, 并要求大众和平抗议以使其声音被倾听的权利。这些要求在根本上就是民主的要求; 而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 民主是一种理想, 它要求积极的公民和对公共事务的严格审查。<sup>②</sup>

安托瓦内塔·季米特洛夫 (Antoaneta L. Dimitrova) 分析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其思考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认为, 说中东欧出现了民主“倒退”容易误导人, 因为“倒退”暗含着在法治被破坏或制度变化之前民主已经建立起来, 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同时, 他认为, 在分析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倒退”时, 应该扩大研究视野, 将精英攫取后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方便其寻租纳入考虑范围, 也应该理解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由精英在转型过程中塑造的, 精英在政治图景中仍然保留着重要的影响。安托瓦内塔·季米特洛夫还认为, 民主“倒退”不仅仅是由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所发动的坏的制度选择的阶段, 相反, 应该做系统的分析, 将其理解为政府与大选区之间的系统性的交互作用, 前者与关键的经济利益相关联, 执政数届, 后者则依赖于这些经济利益, 这些系统性的交互作用导致了较少民主的治

---

① Seán Hanley and Milada Anna Vachudova, “Understanding the Illiberal tur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3, 2018.

② Zuzana Hudáková, “Czech/o/Slovak Democracy: 30 Years in the Making”, in *Eurozine*, April 30, 2018.

理框架。最后，通过对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的分析，安托瓦内塔·季米特洛夫认为对政府及其资源的利用是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寻租联盟的持续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对中东欧的民主造成损害：第一，通过正式地改变民主机制以巩固权力；第二，通过非正式地侵蚀人员配置规范和权力的民主制衡原则；第三，通过侵蚀公民对民主的信任以及产生不同精英和不同政策的能力。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已经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并逐渐为公民所接受，这种交互作用造成了寻租和庇护，并使之成为可能。<sup>①</sup>

丹尼尔·代亚努（Daniel Dăianu）则从概念入手对民主进行了分析，并进而回应当前中东欧所出现的政治现象。他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划分在概念和实际操作上都具有意义，但也引起困惑。因为民主有自由主义的基因；自由主义在深层含义上体现了对一系列事实上的（de facto）和法律上的（de jure）价值的精神承诺和公民承诺。这些价值及相关的政体在根本上是指权力在公民（人民）手中，决策通过制度化的制衡做出——这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其他人称作抗衡势力，它阻止权力被无限地积累。民主意味着诸权力的有效分离；它也意味着尊重同胞公民，意味着宽容，以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行为。由于对民主的这种解释，自由主义是民主政党世界观的一个根本的和有机的基础；这个基础存在于从右到左的民主光谱中，存在于政党政治的哲学和行为中。当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吸纳政治竞争的原则和民主政治体制时，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包含自由主义元素。进而，丹尼尔·代亚努指出，在工业化世界和民主社会中，非自由主义的诱惑却正在上升。那么，这些诱惑只是我们所处的“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还是有着更深的根源？通过对社会和经济趋势、新（而非传统）威胁的紧迫性，以及失败的公共政策的考察，丹尼尔·代亚努认为，在政策还可以被修正，公民和精英还没有丧失对民主价值的信心的范围内，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衰落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以下观点是对的，即民主有其“自由主义内核”，它也可以被“非自由主义的”要素所驱动，而“非自由主义”要素的大小也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民主要想幸存，其自由主义内核

---

① Antoaneta L. Dimitrova, “The Uncertain Road to Sustainable Democracy: Elite Coalitions, Citizen Protests and the Prospects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no. 3, 2018.

必须被保存。<sup>①</sup>

在多数学者对中东欧出现的民主“倒退”表示担心时，罗兰·克拉克（Roland Clark）则通过罗马尼亚的社会抗议运动看到了民主发展的迹象。2018年8月10日，即周五，大约12万人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胜利广场，要求执政的社会民主党（PSD）下台，因为其解雇了一名高级检察官劳拉·科德茹查·科维什（Laura Codruta Kövesi），她一直在调查针对政治家的腐败指控。罗兰·克拉克指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从2016年末以来就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出现，但是直到2017年1月新当选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一系列大赦特定犯罪的法律之后，集会才激化并聚集到胜利广场。这些特赦法律的主要受益人是社会民主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他因欺诈和滥用职权而被判缓刑；另一个是媒体大亨和亿万富翁丹·沃伊库勒斯库（Dan Voiculescu），他因洗钱而被判入狱。另外，围绕着标签“rezist”而展开的网络动员到2017年2月初所动员的全国人数超过了50万，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上街抗议滥用权力。罗兰·克拉克认为，街头抗议揭示了罗马尼亚社会的重要分歧，一方是看重自由民主规范的人，另一方是当他们认为有利于国家最大利益时而对“破坏规则”感到从容的人。尽管社会民主党现在遭到了社会抗议运动的抨击，但是，社会民主党是以绝对多数赢得了2016年选举的。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主要是退休的人、家庭主妇、失业者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但是社会学的选举分析则指出，社会民主党现在能够吸引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主要是政府雇员或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员。罗兰·克拉克特别提到，选民似乎很清楚主要的政治家们卷入了严重的腐败，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投票给社会民主党，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当时的总统莱扬·伯塞斯库（Traian Băsescu）监管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政府运用紧缩政策，削减了退休金和政府工资，而社会民主党则承诺增加工资。罗兰·克拉克认为，罗马尼亚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典型的街头抗议，这些抗议者们未能持续地支持任何领导人或政党，也没有具体的要求，除了要求政府在下台之前重建反腐败法之外。不过，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这些抗议有增无减地持续了20个月，这是令人吃惊的，同时也显示了抗议者对政府的愤怒。罗兰·克拉克认

---

① Daniel Dăianú, “Is Democracy Doomed to Lose its Liberal Core?” in *Eurozine*, August 3, 2018.



为，在没有来自总统或反对党的重要反对者的情况下，街头抗议者成为唯一阻止政府破坏这个国家自由民主的力量。<sup>①</sup>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东欧民主状况的讨论，主流观点遵从的是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民粹主义所揭示的民主新现象却反映了中东欧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从具体政治生态来看，中东欧社会的腐败问题在民粹主义运动和思潮兴起的背景下被凸显和放大了，这些问题在转型话语中被掩盖，但是现在却被暴露出来。如果不解决好腐败问题，不论是民主问题还是民生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左翼政党也并不如同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改善中东欧现有的政治生态。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自 2016 年赢得选举以来已经受到了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反对，而捷摩共 (KS&M) 则成为 ANO2011 的议会外支持力量，尽管 ANO2011 的领导人巴比什深陷腐败和利益冲突的丑闻。<sup>②</sup>

### 三、左翼激进主义：边缘化抑或复兴？

拉鲁卡·阿巴塞卡 (Raluca Abăseacă) 和格雷格·皮奥特罗夫斯基 (Grzegorz Piotrowski) 对中东欧激进左翼的现状进行了概述。他们指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中东欧普遍对左翼持敌视态度，但是近年来的右翼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却为研究中东欧地区的左翼提供了新的背景。从左翼本身来看，中东欧地区的左翼批判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化，而是凸显其实用主义的、具体的和渐进的行动主张。事实上，左翼行动竭力使世界明白，他们并不旨在夺权，而是旨在改变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情感方式和人际关系，旨在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这个不一样的世界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左翼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努力与旧体制保持距离。通过对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尼亚激进左翼的考察，拉鲁卡·阿巴塞卡和格雷格·皮奥特罗夫斯基认为以下这点值得重视：如果说激进左翼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重要挑战被限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历史垃圾箱里，那么在世纪之交开始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年，学术界对左翼激进主义的兴趣日增。对

---

① Roland Clark, "Marching for Liberal Democracy: The Phenomenon of Street Protests in Romania", in *Eurozine*, August 29, 2018.

②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806/20180602760431.shtml>.

社会经济的不满体现在世纪之交全球正义运动的动员和反紧缩的抗议中，从2010年开始，关于劳动权利、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议题日益引起关注。在中东欧，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新的争论、组织和运动形式区别于共产主义之后的市民社会组织，这些市民社会组织发展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草根运动的出现和中东欧激进主义者向地方层面的转向既是挑战后共产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化的努力，也是重新思考这一地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努力。<sup>①</sup>

拉鲁卡·阿巴塞卡具体分析了罗马尼亚的议会外激进左翼。他认为，在罗马尼亚，以社会和经济权力为框架的议题比以反腐败为框架的议题机会小。与社会—经济的诉求相比，围绕着腐败议题进行的动员社会“反响”更大，并且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被看作更加具有合法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接受度也更高。拉鲁卡·阿巴塞卡指出，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花了几乎10年时间才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追随波兰激发的休克疗法，甚至也没有追随渐进主义的匈牙利改革。2000年，阿德里安·讷斯塔塞（Adrian Năstase）的社会民主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和通过将公共资源用作私人用途而催生地方企业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后者则使得人们不信任政府机构并且将其看作是腐败的。大衰退加剧了政府从社会保护中撤出，这对罗马尼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失业率的爆发和预算赤字。除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被削减25%，公共养老金被削减15%之外，政府将社会保障支出从2.9%压缩至2%。2010年，议会通过一项新的劳动法，规定通过执行定期合同使工作更具有灵活性。时任总统特莱扬·伯塞斯库经常将反腐斗争和削减公共开支，即削减公共领域及公务员的开支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因为公务员被视为腐败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共产主义的议会外的激进左翼规模是很小的，他们自己也并不倾向于与政治家进行对话，而是倾向于阶级分析或以冲突为基础的辩论。反腐败斗争的动员情况则大不相同。2015年和2017年的反腐败动员成功获得了社会效应、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知名度。腐败问题是罗马尼亚公民社会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个问题被反腐败动员抓住了。并且，激进左翼强调西方自由民主的局限，而2017年的反腐败激进分子则强调对公民权利的诉求。例如，公共机构的透明性、分权和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这些诉求为他们的动员和社

---

① Raluca Abăseac & Grzegorz Piotrowski, “Introduction: Radical Lef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Jan 17, 2018.



会效应都提供了机遇。不仅如此，在 2017 年的反腐败抗议中，对公民权利的诉求和对经济的不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和“高工资与高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在总统府前集合，其形象和反腐败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制造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议题之间的空间划分。<sup>①</sup>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自 1989 年以来中东欧激进左翼一直被边缘化，但是，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左翼开始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和关注，左翼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主张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弊端的日益凸显而变得不再那么与现实相左。不过，从社会动员的影响力来看，激进左翼的社会动员仍然具有很大局限性，其号召力远不及反腐败动员的号召力大。反腐败已经成为目前中东欧社会动员的主要议题之一，激进左翼如何将其左翼理念与反腐败议题相结合，这可能才是中东欧左翼在未来进行社会动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向。

#### 四、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议题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并不突出，但是仍然有学者关注着这一问题。

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 (Waldemar Kuligowski) 通过分析 1989 年以来波兰的文化杂志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他指出，1989 年之后文化杂志是繁荣波兰知识生活的核心，并且具有空前绝后的发行量。然而，新自由主义破坏了这些杂志的流行和财务生存能力。对公共补贴的依赖使这些杂志日益衰弱。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列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2018 年 3 月，《时尚》(Vogue) 杂志波兰版第一期发布，巧合的是，已经存在了六十年的杂志《波罗西亚》(Borussia) 则出版了其最后一期。这个杂志是 1991 年之后由波兰东北部马祖里亚 (Masuria) 地区的“波罗西亚”文化社区协会 (“Borussia” Cultural Community Association) 出版的。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认为，《时尚》取代《波罗西亚》就是全球市场取代地方性和草根性，这暴露出了中欧对西欧核心的归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其依赖的相对不可见，即“依赖民意” (dependence doxa)，而对“依赖民意”的理解应该扩大到地缘政治叙事、新帝

---

<sup>①</sup> Raluca Abséacă, “Between Continuities and Social Change: Extra-Parliamentary Radical Left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1, 2018.

国主义和资本的分配。在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看来，1989年以来的波兰文化杂志的历史也可以被视为当代波兰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杂志提供了讨论的平台，介绍了之前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的话题；文化杂志为哲学或艺术的新思考提供了素材，并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了教育的角色。但是，自由市场却通过容易获取的新技术，例如，电脑和视频的出现破坏了书写文字的权威。1989年以来，波兰人对自由市场充满了盲信，这是因为“依赖民意”不仅接管了实践而且接管了人们的思想。尽管距离1989年已经超过了25年，但是市场似乎还是优先的预定的模式，这体现在意识形态中，植根于以情感结构为特征的转型。<sup>①</sup>

瓦尔德玛尔·库里戈夫斯基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情境，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顺从。导致这种复杂情境和心理的最关键原因是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思潮正在中东欧（甚至全球）兴起。

2018年中东欧左翼及主流的社会思潮为我们展现了中东欧正在经历的问题，尽管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是问题本身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中东欧政治和文化，也将更好地理解全球政治及其前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

① Waldemar Kuligowski, "A Destabilized Community: Polish Cultural Journal Since 1989", in *Eurozine*, July 5, 2018.